

曾国藩兵语录

(增补本)

蔡 锷 辑录

名将蔡锷亲自辑录 黄埔军校历届教材
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统兵之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留白译注 张爱民导读

蔡锷辑录 蒋中正增补

曾胡治兵语录

(增补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胡治兵语录(增补本)/蔡锷辑录;留白译注.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633 - 6248 - 6

I. ①曾… II. ①蔡… ②留… III. ①兵法 - 中国 - 清代
②曾国藩(1811 ~ 1872) - 语录 ③胡林翼(1812 ~ 1861) - 语录 IV. ①E892.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1970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 划: 张爱民
责任编辑: 魏 东 刘 丹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14.5 字数: 150 千字

2012 年 3 月第 2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曾国藩像



胡林翼像

例 言

一、《曾胡治兵语录》是近代著名的语录体军事著作,蔡锷辑录,共十二章,一万四千余字。集中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和治兵谋略,在我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价值。

二、此书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1924年蒋中正将此书作为黄埔军校教材,并增辑《治心》一章,共十三章,以“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之名出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1995年,巴蜀书社复将增补本整理出版,陈志学译注,书后附有《曾国藩论军事谋略》万余言。此后又有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等诸多版本。我们这次整理译注,以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所藏蒋中正增补本为底本,参校陈志学译注本,择善而从,文字更为可靠,注释更为详赡,力求奉献给读者一部相对完善的读本。

三、本书将曾、胡的治兵语录,以阿拉伯数字做了排序,纲举目张,便于读者观览。

四、本书使用简体规范字,现代标点,对蒋氏增补本中明显的错字,径自用圆括符()标出,并加以改正,改正字加方括符[]。蒋本中的衍字以()标明,据它本增补之字则用[]标明,一般不出校语。

五、本书各章均分设三个部分：

(一)题解,对该章主旨作简要解释;

(二)原文及注释,录《曾胡治兵语录》原文并详加注释;

(三)译文,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的白话今译。

六、蒋中正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因其语言易懂,不再加以注释。

七、本书还将散见于曾国藩书信、日记、杂著中,而《曾胡治兵语录》未收的相关语录搜求寻绎,共得近二百条,附录于书后,所录材料一律注明原始出处,供读者参考,一般不再作注释和翻译。我们参考了谢树坤、王澧华、陈志学等先生的著作,以及《曾国藩家书(上下)》(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4 年版)、《曾国藩日记(上中下)》(南方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书,特此说明。

八、本书注释和翻译采用章内分段注译的形式,即将每章分成若干部分,对每一部分分别进行注译,自成起讫,以便读者阅读。

九、对书中出现过的历史人物均以脚注形式进行简要介绍。

十、本书还将部分条目的出处考出,并以脚注形式注明。

作为译注者,限于才识学力,难免会有不少错误,敬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留 白

2007 年 9 月于同济大学

导 读

《曾胡治兵语录》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著名的语录体兵书,中国十大兵书之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和治军方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被蒋中正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

《曾胡治兵语录》虽成书于1911年,但最初只是作为教材使用,并未传之社会。其编写者蔡锷逝世一年后,即1917年,才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此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7年中国书店《古代兵经》本等。

一、关于编写者及编写缘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后改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爱国将领、军事家。

自幼聪慧好学,14岁中秀才,15岁考入当时有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提倡变法维新的谭嗣同、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任教,谭嗣同任学堂总监,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

年轻的蔡锷深受谭、梁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就义,梁启超亡

命日本。朝政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蔡锷深受刺激，曾计划行刺慈禧太后，因故未果。

1899 年赴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 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其间著有《军事计划》一书，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治军用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1911 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调云南，任新军第 19 镇第 37 协协统。1 月下旬，英国军队入侵我云南边境别马地区。蔡锷感到，军人为国尽职的时候到了。但见新军风气败坏、军纪涣散，十分焦急，很想为改变风气、鼓舞士气做出应有的贡献。恰在此时，第 19 镇统制钟麟同找到蔡锷，要他编写一个针对军人的“精神讲话”。于是，蔡锷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以阐述自己关于治军的见解，希望借此唤醒军心，把新军训练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书中的曾、胡，系指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

武昌起义爆发，他与革命党人密商响应，10 月 30 日在昆明组织武装起义，次日起义军占领全城，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不久，他鉴于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南地区，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

1913 年被袁世凯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等职，授将军府昭威将军。

1915 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 12 月 25 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他抱病率第 1 军入川，依靠人民支援和士气优势，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同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鏖战川南，克宜宾、江安、纳溪等地。

1916 年 6 月，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1 月 8 日病逝于日本。

二、关于曾国藩与胡林翼

曾国藩、胡林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湘军的核心人物。二人都是“儒将”，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注意借鉴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在京师做官期间，曾氏究心于诗文和理学，有“一代儒宗”之称。

1853年，太平军以势不可挡之势进攻湖南，清廷上下惊恐万分。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也被皇帝指派于家乡“帮办团练”，以阻击太平军的攻势。从此，曾氏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创水师，逐步建立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世称湘军。随后率湘军出省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战略要地武昌田家镇，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其水师在湖口遭太平军重创，被迫退守南昌。次年，趁太平军天京内乱之际，重新聚集力量，再次夺回武汉、九江等地。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分兵三路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衔。次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战败去职。后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872年病故于南京。著作被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胡林翼(1812—1861)，字貺生，号润之，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

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次年补黎平知府。1854年补贵东道

员,率黔勇到湖北,与曾国藩一同阻击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从此与曾国藩同任湘军统帅。次年配合曾国藩进攻江西九江、湖口,升任湖北布政使,回救武昌。1856年任湖北巡抚,以湖北财力全力支持曾国藩,并多次派部增援庐州(今合肥)、安庆。1861年9月,因所遣之部攻陷安庆,加太子太保銜。不久,太平军攻克黄州(今黄冈),迫近武昌,胡氏惊忧成疾,呕血而亡。其著作被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三、蔡锷对曾胡治军思想的敬重与推崇

曾胡维持的是封建的清王朝,用以来治理湘军的思想武器也主要体现的是封建传统文化,但他们的思想言行有着经世致用的实学特色,并且在实践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曾国藩逝世10年后才出生的蔡锷,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也予以相当程度的认同。他从内心深处对曾胡这两位同乡先贤的事功尤其是治军方略表示出钦敬之情,对他们的军事才干十分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认为他们的兵学言论大都切中近代军事时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尽管曾胡是为清王朝服务的人物,但蔡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把他们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榜样来看待,尤其是对曾胡在治军方面的思想主张,从总体上予以了认同。

1. 对曾胡“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来选拔和培养将领的思想,蔡锷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

曾胡在治理湘军时,继承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把“练将”摆在十分重要地位的经验,反复强调:“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中心我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带兵

之人,须智深勇沈、文经武纬之才。……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由貌似四者,终不可恃。”(以上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对此,蔡锷认为其主旨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与西方军事家所说的“天所持赋之智与勇”基本相似,且有了新的发展。“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这一治军思想,是曾胡等人从实践中得来。蔡锷充分肯定了曾胡等人“以忠义血性”作为治军思想这一重要内容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吸取继承过来,用以唤起革命军人为推翻清王朝、建设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自觉性。这种态度,反映了蔡锷的实学精神非常明显:尽管蔡锷所处的时代比曾胡的时代已前进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蔡锷根据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实情,从总体上对曾胡的治军思想加以认同,是符合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的。

2. 对于曾胡提出的将才由“陶冶而成”,不必拘定一格,应使其各显其长,各去其短的主张,蔡锷表示完全赞同。

曾胡将将才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如果能做到“智略深远”又“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之将。然而,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将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曾胡主张用人尤其是使用将才不须规定一格,不必求全责备,重要的是发挥各人的专长,在实践中锻炼其才干。对此,蔡锷作了具体阐发:“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而“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但并非专指一二人,譬如官长居士兵之上位,中级官居下级官之上位等,人人都有责任从自己做起,关键的问题是应当“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这样的话,“风

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蔡锷强调，只有像曾胡所倡导“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互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倾”，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日趋于善”的效果。

3. 对于曾胡所主张的以“诚实”二字引导士兵养成高尚的志向，不为金钱、地位所诱惑，做到“忠愤耿耿”的治军思想，蔡锷推崇为“至理名言”。

曾胡反复指出：对于部属重要的不在于怂恿他们如何去猎取地位金钱之大小多寡，“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对于这一观点，蔡锷作出评论。他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在时局日坏、兵祸频繁之际，如果下定了“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的志向，就“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的精神，去达到最终目的。反之，如果做将官的人都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做士兵的人都“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那么国家民族的兴旺和前途，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曾胡认为，要使将领和兵勇相互信任支持，不去追逐金钱地位，凡必须始终坚持一个“诚”字和一个“实”字，反复启发引导人人心中内在的良知。蔡锷明确认定这是决定一支部队能否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军营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全靠万众“不容有丝毫芥蒂”。要能做到令部下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就必须像曾胡所主张的那样，用“诚实”二字来“贯串”、来“维系”感情；否则就会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

4. 对于曾胡有关公正廉明、知人晓事的治军思想，蔡锷充分肯定其“持论至为正当”。

曾胡用人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是由于他们有一套完整的人

才理论,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这就是做到“公正廉明”然后才能“知人晓事”,治军更是如此。蔡锷则认为,用人能否相当,取决于对人的了解是否明了;办事是否有才能,取决于看问题是否透彻。这其中有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曾胡所说的,辨别一个好的将领是君子还是小人,最重要的要看他“能否利人济物”。如果所用的人不能称职,所办的事得不到好结果,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终究也难成好官、好将领。自古以来,一切公正廉明的圣贤之士,在用人方面一般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蔡锷列举曾国藩荐举左宗棠而不计较私嫌,弹劾李元度而不念旧情的实例来加以论证,高度赞扬曾氏“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众所周知,曾胡以知人善用闻名于近代中国,清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名臣”,大都与他们的荐举提拔有关,他们在从政、治军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蔡锷及其统率的军队处于内忧外患并至的非常时期,所以他对于曾胡知人善用的治军思想,很自然地产生了予以继承的迫切愿望。

5. 对于曾胡提出的“恩威相生”的治军思想,蔡锷表示充分的认同。

曾胡治军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力将孔孟“仁”和“礼”的思想融合于士兵的言行之中,把封建的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联成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关系来掩饰、调剂、弥补将帅之间和士兵之间的摩擦与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甚至为之死力卖命,在所不惜。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曾胡反复强调要坚持“仁爱”和“严肃”即“恩威并用”这四个字。什么是“仁爱”呢?据曾胡解释,军人既然以军营为第二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

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这是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爱互助，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什么是“严肃”呢？曾胡认为，军事不同于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从而，他们又主张对士兵要用“严肃”二字即进行纪律性的训练：对待兵勇不可过于宽纵，平时之规矩，应当严格执行，“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他们反复强调，在抓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同时，应严格禁止此营议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在行军驻扎之时，不准扰害百姓。为了严肃军规军纪，针对兵勇中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特点，曾胡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的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蔡锷充分肯定曾国藩所说的“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语，以为“最为兹仁贴切”。如果谁能真正将曾国藩这一名言时常存于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上，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去熟读古今兵书所言带兵之道了。蔡锷具体作了解释：如果做官长的、做上级的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事事处处都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那么他就能做到：当他感到士兵愚顽无知时，则会想方设法开导他们；看到士兵饥寒苦痛时，则会百般爱护关心他们；发觉士兵放荡无羁、浮华不实时，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细心诱导等等。这一切，无论是宽容还是严厉，是爱护还是憎恨，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出于“至诚无伪”，都会起到感化、启迪士兵情感，使之人人学好、个个成材的积极效果。反过来，“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

蔡锷亦推崇曾国藩所说的“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是“亲切有味”，并且作了详尽的阐发。他认为，原因在于官长与兵勇之间

的相处是师友般的平等关系；官长对于兵勇的约束督责、百般爱护的情谊，就如父兄对子弟一般的至亲纯净；士兵对于官长如果能做到“恪恭将事”，也就如子弟对于师长父兄那样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样，官长与兵勇就会在平时彼此和睦相处，战时同患难共生死，去为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蔡锷还特别强调，应该将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的观点，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体会实践。他具体解释其理由说，用兵本来就是为了安民。国家有难，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爱民为本，而是去扰害百姓，那么就是“悖用兵之本旨”。这样，不仅在筹集粮饷、征发夫役、探访敌情等方面得不到积极的支助，且将“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

四、关于《曾胡治兵语录》

中国兵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有人统计，现今存世与存目的兵书约 3300 部，23500 卷，如果再加上已散失不见著录者，中国兵书当在 4000 部，3 万卷左右。目前最著名的兵书有十种，它们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

在编评《曾胡治兵语录》过程中，蔡锷对曾胡的军事战略战术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指出了这些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蔡锷十分推崇曾胡，但并不囿于曾胡的理论，而是根据国情现实提出了诱敌深入、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军事思想。蔡锷在每章之末，都附有一段简略的按语，或对本章大意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按语中，蔡锷根据新

的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曾胡的某些言论做了修正,很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将材(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共十三章,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前十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后三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将材》一章,主要论述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大家知道,曾胡兴兵之日,正是晚清政治最腐败的时候。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早已渗入军队,当时的官军八旗、绿营,将帅贪鄙,士兵离心,军纪松弛。在太平军面前,官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针对这种局面,曾胡认为,用兵须先治兵,治兵须先治将。他们一再强调,“天下强兵在将”,就是这个意思。从《将材》看,曾胡治将,又首重选将。他们要求将领除了具备基本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才堪治民”,可谓文武并重、德才兼求。而在众多要求中,又最重道德品质,即须“有良心,有血性”。

曾胡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也同样重视。胡林翼说:“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

从《用人》一章看,曾胡对中下级军官虽重选拔,但更重培养。他们一再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所长,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培养和熏陶。

《尚志》、《诚实》、《勇毅》三章,都是讲军人的修养和素质。曾胡认为,做人要有远大志向,做军人也要立志高远、淡泊名利。胡林翼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本着这样的认识,曾胡指出,治理军队应该先治人心。曾胡认为,军人做到诚实质朴,这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的